新作述评

《只有一条长江》:

用文字丈量长江

全长约6300千米的长江,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,干流流经青海、西藏、四川、云南、重庆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和上海共11个省、区、市,最终于上海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。李海洲主编的《只有一条长江》(重庆出版社),不仅以文字丈量了长江的长度,更串联起中华民族与母亲河共生的数千年历史。在奔腾中,长江接纳了与它相遇的河流,以有容乃大的宽容和气度,最终从青藏高原的溪流开始,成长为举世闻名的世界第三大河。

一

《只有一条长江》围绕这条横贯中国的大河,讲述数千年中华文明史。精彩细节比比皆是,比如长江支流岷江流域孕育出悠久的古蜀文明,而2000多年前李冰父子在都江堰修建鱼嘴堤坝,成就了"天府之国";再比如抗战初期,大量物资从上海、南京,经武汉、宜昌,逆长江而上运往重庆,还有众多高校师生与各界知识分子,也沿着这条黄金水道迁至西南地区,写就了动人的"南渡""西迁"故事,为抗战储备了力量……长江从远古走来,一直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携手同行,危时相助,盛时欢呼,托举着中华民族的繁衍与兴旺。

《只有一条长江》告诉我们,一个名字,就是一段扎根于泥土的故事。"长江"作为整体存在时,是一条大河,但具体锚定到某一段,它又有着不同的名字。一条条涓涓细流从格拉丹东冰川流下,汇聚成沱沱河,是为长江的源头。沱沱河与当曲汇合后,被称为"通天河"。流至青海玉树直门达后,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——金沙江,这个名字记录了先民在江畔淘金的历史。金沙江一路奔腾,在四川宜宾结束了它的旅程,从这里开始,这条大河被正式命名为"长江",宜宾也因此被誉为"万里长江第一城"。在下游,长江仍保留着地域性的别称,如安徽的皖江和历史上闻名于世的扬子江。

这里的每一个名字都不是简单的标签。从符号学角度看,命名主体对被命名对象的赋名行为是一种情感性的指认,它是关系的总和:祖辈们根据河流的形态、功能,赋予它某个称谓,然后这一称谓作为牢固的媒介,承载着人们与江水绵延不绝的情感交流。不同的名字是祖辈用生活、信仰铭刻在长江上的符号,是长江与不同地域、不同时代的人们交往、共生的证明。

《只有一条长江》对长江的书写并非停留在地图册式的景点罗列,而是结合当地的地域文化,结合具体的人与事,让读者了解到一条有生命、有温度的江河。书中写道,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,"马背上的护河使者"才文尼玛带队巡护益曲河,环保卫士才培日复一日地保卫草原生态……正是这些普通却不平凡的康巴汉子的故事,让我们知道保护"中华水塔"不只是口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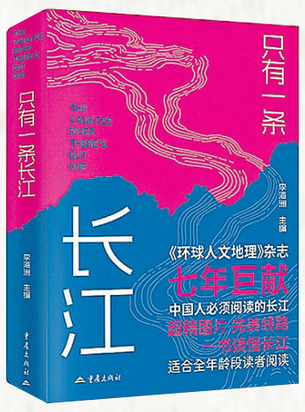
二

阅读过程中,文字里的描写总会让我想象自己就站在长江边。我想从书中穿越到现场,去看看被当地人称为"神物"的雪豹。读到书中对姜根迪如冰川的描写,"远处的积雪像格拉丹东常年戴着的一顶白色帽子,朵朵白云移动……雪山顶部的水闸忽然失灵,让雪山上的蓄水倾泻而下……"我就特别期待置身其中,亲眼看看远处冰雪覆盖的山峦。关于长江在云南石鼓镇的那个"V"字形弯,作者说:"不敢假设长江没有转弯……倘若没有这惊天动地的一次拐弯,金沙江极有可能会和另外两条江一样,一路向南,最终奔出国境,成为一条国际河流。"的确,没有这个拐弯,就不会有今天意义上的"长江"。我不由得对云南石鼓镇有了立即奔赴的神往。

没有在多江交汇地生活过的人,很难想象看到泾渭分明的两条江交汇时的震撼,在四川宜宾,当碧绿的岷江和浑浊的金沙江拥抱,江上的渔船仿佛置身青黄分明的国画中。在"魔幻8D城市"重庆,除了洪崖洞、朝天门码头、火锅之外,江水流过历史厚重的钓鱼城。在江西,"五河入湖"的鄱阳湖是长江中游最大的淡水湖,每年枯水期,落星墩会露出来,千百年来,它倔强倨傲地伫立,看水涨水落,人来人往,是鄱阳湖忠实的"老朋友"……这些文字,是作者替长江对人们发出的召唤。

三

视觉审美是《只有一条长江》的另一亮点。封面上宝石蓝与玫瑰红的色彩冲撞勾勒出长江的走势,切割不规则的腰封展开的是长江的流向图,这是读者"触摸"到的长江。书中的图片,来自国



内多位知名摄影家之手。而图片之外的绘制图,最能体现编者的巧思。全书按照省域共分八卷,每卷开篇是一张跨版图和一幅线描小图,跨版图是长江水系的水流区间示意图,区间图上标示出重点流经地,小图是该篇中最经典的地理风景图。

书读到结尾,被那句"河水如生命,接纳是最高贵的跋涉"深深震撼,心中不禁生发出对母亲河的敬畏,还有对文明传承的思考。长江从来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。只有站在长江岸边,你才能够理解"只有一条长江"的深意,你面对的不仅是流动的水流,更是一部流动的历史,只有了解长江的过去和现在,才能更好地守护长江的未来。

《只有一条长江》是一封写给长江的信,也是一封写给读者的邀请函。我想,编者还有一个意图是:请读者读完"这封信",走出家门,去长江边走走,吹吹文字里没有的江风,闻闻江水的味道。

李梦梦

《谷物的故事》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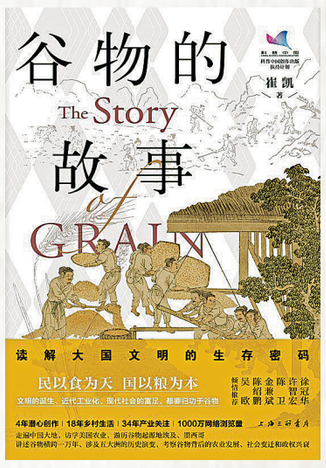
以谷物视角看人类历史

民以食为天。但所有的古代文明体系几乎都选择谷物作为主粮,而非木薯、山药、芋头。在植物学分类中,谷物是禾本科成员,包括水稻、小麦、玉米、高粱、小米等,目前它们占据了地球耕地总面积的70%,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家族。上海交通大学崔凯教授《谷物的故事》一书,即以谷物的视角梳理人类的文明发展史。

众所周知,谷物的祖先源自荒野中随处可见的野草,野草种子包裹在颖壳和麸皮中,表皮口感艰涩,既没有艳丽的色彩,也没有刺激味蕾的芳香,很难生吃;与此同时,人类是杂食动物,在自然界中渔猎的飞禽走兽,以及采集的块茎野果坚果等食物,口感远好过野草种子。故而在漫长的进化史上,人类的食谱长期来自渔猎与采集。

人类食谱的变化始于1.3万年前,野草种子由此参与到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。作者用一系列的数据勾勒这一进程:1.3万年前,地球遭遇了一次冰河期,人类不得不吃起了草籽,就此开启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谷物驯化历程;1.2万年前,冰河期终于结束,气温回升。这段温暖期对人类弥足珍贵,人类祖先抓住这一窗口期,谷物种植的"星星之火"开始燎原,农业种植逐渐取代采集和狩猎活动,人类步入定居农业阶段;对于定居农业而言,农业时间的测定和管理是种植农业的根本,农时一误,收成即无,故"观象授时"成为农业文明的根本,人们就在认知天文地理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文明体系;5000多年前,小麦、水稻、小米、高粱等谷物已经在田野中各就各位,人口汇聚成村落、城镇和国家,孕育出我们所熟知的两河文明、古埃及文明和华夏文明;2500年前,欧亚大陆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征战四方的大帝国,物种开始随着军队的脚步加速传播;500年前,地理大发现将世界融为一体,有了我们今天丰盛的餐桌。

假如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比作一天24小时,那么21时30分(4.7亿年前)植物从水中登上陆地,22时10分(3.6亿年前)种子植物开始出



现,人类直立行走的400万年发生在23时58分45秒,人类种植谷物的1万年只是最后的0.2秒。然而就是在这最后0.2秒才出现的谷物,使得人类历史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。文明的诞生、近代工业化、现代社会的富足,追根溯源,都要归功于它的出现。

在诸多食物中,谷物为何能最终成为人类主粮?书中给出了三个理由:一是从营养学角度而言,谷物富含高能量的淀粉,能够为人类在荒野生存中提供能量。相比之下,蔬菜和水果中缺少能量物质,只能作为副食,增加营养和口味。今天很多人为了减肥选择"少吃饭多吃菜"就是这个道理;二是从便于储存的角度而言,人类没有冬眠的功能,入冬以后只能靠囤积的食物果腹。肉类、水果和蔬菜的含水量过高,很容易腐烂变质,不能长期存放。而谷物的含水量只有15%,收获以后会进入休眠状态,能够存放几年,从而帮助人类熬过食物短缺的日子;三是从便于培育的角度,谷物种子在胚乳中备足了营养物质,又包裹上能够遮风挡雨的种皮。种子落入泥土中,条件不好时就休眠,少则一个冬季,多则几年,待到温湿度适宜时再生根发芽。这种特性使得种子植物能够抵御恶劣气候并适应环境的变化,经过几千年的优胜劣汰,最终成为人类的主粮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/图

《空山寂》:

生命赞歌回荡佤山中

佤族诗人张伟锋诗集《空山寂》,是中国作协"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"中的一册。诗集共四辑,分别为"寂然录""慰藉书""孤影集""空山赋"。从中可见诗人对自然的感知、感悟和自省,诗人延续着他的生态诗学创作理念,强调了人与自然由表及里的关联。

诗集《空山寂》的四辑书写,都是从日常开始,转向所遇的佤山。文本注入了诗人的个体精神和来自族群血脉的自然哲思。诗人寄情于景物、扬志于景物,《落寞》《途中记》《山间小路》《画石头》等诗中,出现了天空、雨水、黑暗、幽深、陷入、坚硬等词语,在佤山生存活动中得来的生命体验,被带入诗作的自然语境中。"在石头上作画。画一座院子"(《画石头》);"落了千年的雨水,依然落不尽/……我静坐在滑倒的地上,等待搀扶"(《冷雨经》)。诗人自带的族群记忆,及从词源上散发出的原乡情结,构筑起精神世界的返乡。诗人的书写充盈着天性的纯粹和静美,这与他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紧密相关。《空山寂》是自然的、现代的,诗人的写作过程自如地转化着诗歌的天然属性。

张伟锋是新一代佤族知识分子,他很好地呵护着与自然、与佤山的联系。在《茈碧湖》中,诗人写道,"晨起,在茈碧湖畔/喂马,劈柴,谋生——/我过着的生活/别人也在过。我得到的幸福/别人也该得到……劳顿之神,在一滴水中开悟/它获得了永恒的超脱。"他从自己的生命境遇间捕捉到诗意的落点,在书写自然的过程里将情感驻留,并层层递进,最终展示出边地少数民族的个体生命体验及精神成长。

张伟锋的诗集,强调生态文化、族群文化在当今社会背景下,所具有的精神归属意义,这构成诗人的处世态度和胸襟。"我住在山水间。我的瓦房/替我挡住了风和雨"(《无心集》)。诗人从大地上获得成长、思想、力量,佤山是他的信仰。他的诗中常有词语的重复,这种复现词的出现,能够让个性化的情感在诗意间得到强化。"请在佤山,把我叫醒。我热爱的地方/我要一生热爱……酒里,只有酒,只有热烈和赤诚"(《佤山三章》)。族群的古老、神圣、天然和壮阔,在诗人笔尖的物象中流动。他诗行间的自然万象,都依附着佤山而呼吸。他的肉身与灵魂,似乎可以调整着山川草木的自然配置。诗人的地域性表达,关注的是真实的命运体,通过事与物建立属于诗人的精神谱系,完成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。"奔流的江河啊,要去太平洋/途中的我,要去向临沧"(《江河》);"借土养命/以茶安神……一生,受困于一个地方/一生,就像一碗热气萦绕的茶汤"(《茶语九章》),

张伟锋的文学想象、文化传统和现实感悟,揭示了他对族群源地和血脉根骨的忠贞。

《空山寂》可以视为张伟锋更为成熟的诗集,他正视命运中人与自然的欢愉或焦虑。少数民族诗人的诗学走向,必然会是现代文学经验与其族群文化的融合。恰巧,来自佤山的张伟锋正好做到了这一点。

师师

《星座的故事》:

在头顶星空看到神话与文明

当我们仰望浩瀚星空时,到底是在看什么?英国天文科普作家伊恩·里德帕思在其新作《星座的故事》一书里,透过天上的星空看到了神话和文明。

每天夜晚,当太阳回到自己的夜间巢穴,星星就会像魔法精灵一样出现。星座作为这些星辰的组合,自古以来便承载着人类无尽的想象与探索欲望。星座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,人类设立星座的初衷,表达了在看似混乱的夜空中建立起秩序的愿望,从而把黑夜变得人性化。

古人在将星座图案秩序化的过程中,逐渐将星座神格化:公元前3000年左右,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就开始对星空进行观测,将一些星星组合起来并赋予特定的名称和意义,形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星座体系。如昴星团视为女神伊什塔尔的象征,她是爱情、战争和生育之神;猎户座是英雄吉尔伽美什的化身,他的故事在《吉尔伽美什史诗》中被广泛传颂……简言之,星座被认为是众神的象征和使者。古埃及人则认为,天空是女神努特的身体,她每天晚上吞下太阳,第二天早上又将它吐出。星座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它们被认为是女神身体的一部分,或者是与太阳和月亮有关的神灵。故而天狼星被视为女神伊西斯的象征,她是生育、魔法和死亡之神,天狼星的升起标志着尼罗河的泛滥;猎户座为奥西里斯的化身,他是死亡和复活之神……中国古代的星座体系称为"星宿",将头顶的星空分为东方青龙七宿、南方朱雀七宿、西方白虎七宿、北方玄武七宿共二十八宿,每个星宿都有自己的名称、象征意义和神话传说。

公元150年前后,古希腊科学家托勒密推出了一本极富影响力的著作,名为《天文学大成》。在这本书中,托勒密列出了48个星座,如今我们使用的星座系统就是基于这个列表发展而来。之后,多位天文学家又陆续增设了40个星座,填补了托勒密星座间的空白。最终天文学家们达成国际协议,确定将星座系

统划分为88个连续的星座。《星座的故事》一书讲述的就是这88个星座的故事,这些故事构成了古希腊、古罗马神话的缘起。在书中,每个星座所代表的是神话中的人物或动物,夜空就是一块幕布,人类的想象力可以在这块幕布上投射出神灵的行为与化身、神圣的动物以及寓言故事。在人类学会书写之前,夜空已然是一本图画书。

作者注意到,古代西方的星座体系与古代的中国星宿体系存在差异。他认为,与西方星座相比,中国星座在大小、形状和位置上,可塑性都要强得多。它们并非来自神话,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,因此,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统治朝代的更迭,星座的名称与其象征含义也发生了变化;这样一来,某个特定的星座可能有多种释义,有时一个星座名称可能用来指代若干完全不同的星星。

本质上,中西方星座体系的差异体现在目的层面。西方的星座是神祇的化身或象征,代表着他们的力量、特质与使命,其在神话故事中常常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寓意和哲理,由此演化出信仰与哲学;中国的星座用于"观象授时",从指导农业生产、皇家祭祀等活动出发,形成了独特的天、地、人文明体系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/图

《好天气》:

描写一段逐渐销声匿迹的生活

苏童历时11年完成的长篇小说《好天气》,今年5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部小说有着一个环保题材的外壳,小说开篇由彩色天空写起,并将咸水塘一带的环境用"白天气、黑天气、酸天气"来命名……这些因素意味着《好天气》首先是一本有气息、有气味的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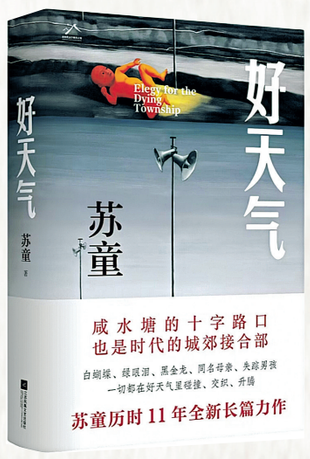
苏童在用"神秘主义"包裹他的往事记忆。不同于"魔幻现实主义","神秘主义"是一代人共同的生命体验,它与超自然力量、精神、心灵有密切的关联。小说人物所处的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"神秘主义"盛行的时期,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那代人,对于《好天气》里"我的祖母"去世后所出现的灵异事件会感觉熟悉。小说家的世界里,那些不可能的确影响并塑造了无数人的心灵与价值观。《好天气》通过对神秘事件的构建与破解,让读者看到了一段逐渐销声匿迹的现实生活。

塘西黄招娣唯一儿子的丢失,使《好天气》拥有了一个强大的悬念内核。这一内核的存在,弥补了《好天气》六个章节像六部中短篇小说所带来的阅读隔离感。苏童以"我"为视角的写作切入点、两个家庭的内部悲剧与外部冲突、对当时社会氛围与世道人心的描写等,均能找到这一神秘事件所激发的波澜或涟漪。

比对的形式,在《好天气》中起到了结构作用:住在塘东的是城市人,住在塘西的是乡村人,咸水塘连接起整个城乡接合部;塘东邓家家长是文化站站长,塘西萧家家长是木匠,两家人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截然不同。但通过对故事背景与人物关系的不断拼接,《好天气》使人清楚地看到书中人物处于"命运共同体"的状态。这样的结构与状态,使得《好天气》的立意变得非常明确——唯有群体的融合与对等,以及权利与权益的公平公正,才能使不同立场的人走到一起,把"坏天气"变成"好天气"。

《好天气》的结构貌似随意,实则严谨。苏童在写作上的这种布局带有他一向的惯性,也有挣脱俗套的努力。小说有直接凌厉的一面,也有细腻繁复的一面,这很苏童。和以前许多作品一样,苏童以少年的身份介入故事,更多的感受与观察成为这部长篇小说情节与细节之间的填缝剂。在书中,苏童既是旁观者,也是冷静、理性甚至不乏学术化的评论者。他不时以当下的身份,用研究、报道、调查等形式,强行介入到小说叙事中。这意味着《好天气》有两个作者,一是少年苏童,一是中老年苏童,前者负责将感性记忆复刻于纸张之上,后者负责以俯视姿态进行诠释、解读——不带感慨,胜过感慨。

《好天气》的文笔与写法,在先锋派小说流行的年代或许不是最具个性的,但在当下的写作、出版、阅读潮流中则显得别



具一格。首先,苏童对乡村生活的守旧一面进行了原样叙述,不批判也不美化;其次,对人性的深邃、欲望的复杂给予了呈现;再次,把人物放置于由环境、观念、生存、文化等构成的时代氛围当中,把"那时的雨"引到"当下的天空",带领读者再次进入历史。由此,作者、故事、读者三者之间拥有了精神上的共振和互动。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